

努力使不同的“学科”或知识传统之间的共识、共享部分逐渐增长？有没有必要及可能融通各个涉及人类学的不同“学科”领域或知识传统，以促成共享的人类学体系或成就一个“人类学界”？抑或继续坐视或促使它们在不同的轨迹上日益“特化”（或“专业化”？）在我看来，社会学与人类学这类主要是（至少在其初始阶段）舶来的知识，在它们的产地原本就属于不尽相同的传统，传入中国后应该在研究中国社会及文化问题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变通和成长为我们新的知识。在涉及或与“中国人类学”相关联的不同传统的知识体系之间，尤其需要的是相互欣赏和相互倾听，而不是不断建构新的壁垒。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不同的知识传统将会长期沿袭，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在中国逐渐成长的一种实际状态。

来自中国社会与文化田野实践基础和学院（和学派）式的学科建构，依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成长的两个互动的重要方面。这是我们缅怀早期中国社会学史上那个人类学传统时也同样能深切体会到的。即便有机构、专家或在学术传承的某个系统里，人们可能致力于建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纯洁性”但面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研究中如此复杂多样、林林总总和层出不穷的实践课题、中国社会学中那个人类传统的存续和发展，依然可能是有重要的甚或难以替代的建设性的。

## 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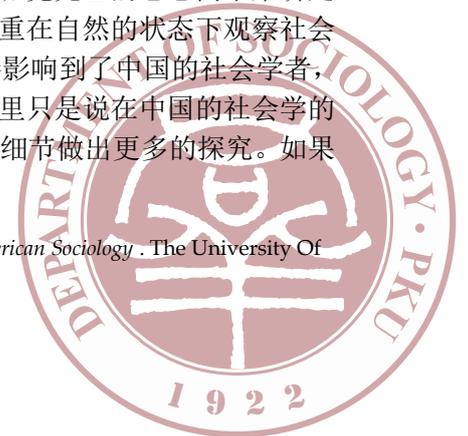
赵旭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讲师

最近看到一本新书是讲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在战后的发展，书的编者将这一发展称之为第二代的芝加哥学派。<sup>1</sup>这里之所以提到芝加哥学派至少有两点原因，首先是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其次是他与中国社会学发轫初期的紧密联系。对于前一个问题，略有些西方社会学史知识的人就会清楚，芝加哥大学自派克（Robert Park）在 30 年代的大力倡导之后，芝大的社会学研究蔚然成风，随后出现了一大批的著名学者。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布鲁默（Herber Blumer），常人方法论的戈夫曼（Goffman）以及直接继承了派克传统的黑金斯（Everett Hughes）等人都出身于或者是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与此同时在战后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渐渐出现了一种对派克的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第二代的芝加哥学派。总而言之这一派的学者是在派克的思想引导下从事着格尔兹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探求，结果虽未完全达到，但却是有有一个学术的奋斗目标。借用一位伟人的话来说，他们是站在了伟人的肩上。

芝加哥学派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应该追溯到派克 1932 年秋天来中国讲学为肇始。吴文藻先生及其弟子聆听派克先生的讲座，并编成《派克社会学论集》出版。派克先生的思想简单来讲是受到了法国的孔德的实证论和德国的齐美尔的冲突社会学的影响，注重在自然的状态下观察社会中人的行为，即是要看这些社会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这样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学者，特别是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路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然我这里只是说在中国的社会学的发展理路中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方交融的传统，并无意要对这段历史的细节做出更多的探究。如果

<sup>1</sup> Gary Alen Fine, 1995, ed,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国的社会学不出现后来诸多的不幸的话，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学或许是另外的一个样子，但历史是无法做假设的，我们只能接受历史的现实是：今天的社会学是在经历了 27 年（1952—1979）的停顿之后才有到今天为止的 20 年的重新发展。今天回忆这 20 年的成绩当然是主流，但是若把这一段的历史当作是一个文本来读的话，我们也会有些对过去所走过的道路的觉醒。

中国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最早强调了要走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中国化绝非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当时的吴文藻先生以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派克先生所主张的实地调查来认识一个社会的方法极为与中国化的精髓相吻合，乃极力倡导派克的社会学学说，并诚邀派克来中国亲自传授他的理论。诸多学子深受派氏的影响而毅然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中去，从事事实地的田野考察，希望以此来认识中国的社会。这样的方法论的逻辑与晚近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的逻辑有了很大的相似之处，从而使得中国这一派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在了一起。当时的学者希望的是通过亲自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考察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当然希望的是通过这样的理解最终能够把当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解救出来。

当然这样的研究路径在经历了 20 几年的停顿之后，又重新得到了社会学界的认同。新的调查开始实施，新的课题开始启动，随之新的调查报告一本接一本的出版，但是许多的读者都感受到后来的这些研究很少能够做到让人一口气读下去的。我们看到了同样是文字加数字的社会学描述，但却让人感到冗长琐碎，东拼西凑，乏味之极。费孝通在谈到这一点时以为这样的东西是缺少了“灵”，即没有一根主线可以将材料很好的组织在一起，因而写出来的东西是平面的，立不起来。<sup>2</sup>这样的解释是很尖锐的，当然也使我们后来的这一辈学者感到惭然。

不过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学恢复 20 年来存在的问题是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变迁这样的时代因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代学者作为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社会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认同出现了分歧。如果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寻求通过批判社会来改造社会的话，那么今天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工程师，他们在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设计图纸，并以他们的文化资本来调动社会的资源以实现这样的工程师般的设想。作为曾经是批评政府的学者变成了国家建设的一分子，忧国忧民的意识丧失殆尽，有的只是对自己的文化霸权毫无反思的对社会发展的支配。落实到学术的实践上则是不大关注社会理论本身在中国的发展，更不会通过自己社会学的思维来批判政府的一意孤行的行为，更多的只是在强化国家的政策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这可以从 1986 年创刊以来的《社会学研究》杂志中登载的大量的对以改革为话语主体的研究文章中可见一斑。

托马斯·摩尔纳（Thomas Molnar）在一本名为《知识分子的衰落》的著作中阐述了上述的观点。<sup>3</sup>在摩尔纳看来，社会存在有三种的意识形态，一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一为进步论者的意识形态，再有就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此三者在今天都已转变成了以进步论者的占上风的社会工程式的规划的意识形态。此时知识分子的角色从批判社会转而成为建构社会。由此人被看成是一架不完美的机器，社会则成了一个实验场，因为它能够提供对社会的工程师有意义的数据，并通过这些数据的获得，借助统计的方法来重新安排和设计社会的资源和配置（Molnar 1994: 213）。<sup>4</sup>

<sup>2</sup> 费孝通先生 1999 年 2 月 7 日上午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的科研人员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自己都有一段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你要取材的东西。光谈一般的感受不行，还有一套属于人的‘灵’的东西，为什么说人家不容易看你的文章，因为你没有触及人家的那个东西，要人家懂，要 symbolize[象征化]，要‘示’，不是讲明白，要有个表示，表示它通了，人同人示。什么叫通呢？怎么能够讲通呢？那就要是你同作者之间发生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抓住了，你的文章就行了。”（根据录音整理）

<sup>3</sup> Molnar, Thomas, 1994, *The Decline of the Intellectual*. Transaction Publishers. 第 199—259 页。

<sup>4</sup> 同注 3，第 213 页。



在这里我无意要夸大前后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责任感上的心理蜕变，以此来佐证我的论点。但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一个敢于说主流的观点不是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潘光旦先生对人口学家的不负责任但却迎合了国家建设口味的论点有过强烈的批评。一位人口学家从国家建设与国民性改造的角度提出了两条偏向国家观点的人种改良的政策，一为晚婚，次为节育。这两点在今天已经真正成为了我们的国策。但当时潘先生的批评虽说执于一端，但却是在学科的路径上考虑问题，而非站在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因此对上述两条斥责为：“殊不知迟婚节育而不为流品上之轩轻，则一种族之良善分子将日趋减杀，其患且甚于任其自然，不加限制”。<sup>5</sup>这样的批判精神在今天的学院派的著作中很少见到，多的只是资料的累积和调查范围的扩大。

如果说在 30 年代提出的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学科里面的真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在社会科学中一直在提的本土化或许就成了建构一种新的权力支配的虚假的问题。这种虚假也许会逐渐地转变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想象的基础。<sup>6</sup>

如果从权力与知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的建议和展望都可能是一种作者对读者的支配，但在必须要说些什么的情景下，我觉得中国社会学应该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上重新担负起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的责任感，自己把自己逼到一个另类声音的范畴中去，想一些学科里面的真问题。调查是社会学家的看家的本领，但调查不是最终的目的，应该在调查中发现生活现实背后的理念，以此来建构我们学科的理论基础。

卡尔·波谱尔 (Karl Popper) 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有一章专门是在论及“整体论和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在他看来这样的一种社会工程的目标是在于要依据确定的计划和蓝图来重新模塑社会的整体。在他看来，实际上社会工程是在自己毁了自己，因为欲求的整体变迁越大，无法预料到的影响就会越大，使得整体的设计者便要拆东墙补西墙，临时拼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社会的设计者或者说工程师越来越信奉不仅要改造社会，而且还要改造人。或者说要求社会的转型和人的改变 (第 67—70 页)。这正如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所总结的，这是将人的冲动组织起来而纳入到一种社会工程师所期望的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的方向上去，因此意识形态在新的、重建的社会中是毫无作用的 (Mannheim: 258)。

由这样的一种反思所必然引申出来的一种反思就是对于中国近现代以来对于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更深层次的就是对现代性的张扬。这种张扬是通过对上述所谓的社会工程的规划来得以实现的。由此所带来的对政权权力的强化和社会问题的频仍或许应该成为我们对现代性在中国的滥觞加以反思的现实基础。

与现代性反思密切相关的就是有关文明的进化史观的追问。这种追问在埃里亚斯、福科、鲍西亚的著作中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不得不使我们承认我们已经站在了后文明的门槛上，对于未来的文明，它或许真的是比我们现在的文明更加的文明或更少文明，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将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明 (Bohannan 1971)，或者更进一步说那或许是文明的终结。这样的思想背景促使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上的启示性的作用。“东方的启蒙”的观点或许过于乐观，但东方影响过西方就像西方影响了东方，特别是中国一样是历史的真实。这里就引申出在文化接触中来反观我们自己文化的生命力的思考路径。现在的问题的核心绝非是社会科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问题，而应该是在两元和多元文化的接触和并置中来理解各自的文化内涵。离开这一点，颠倒的东方学的本土文化的新的支配关系的建立就是社会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最终的结果。

<sup>5</sup> 潘光旦，1960，“中国人口问题”，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人口问题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8 页。原载《人文生物学论丛》，新月书店，1939 年版。

<sup>6</sup> 有关这一问题，我曾在“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社会理论学报》，1999 年，第 2 期，第 81—103 页）一文中有细致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由反思所引发的批判意识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这种反思照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的观点来看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社会分析的对象，其次是这种分析的语言，再次是这种分析的分析者的位置。换言之，先前的以中性的语言来解释原始材料的起支配作用的理想现在受到了挑战，并逐渐为一种在时间的历程中以及在与行动者的意义的关系上来理解人类的行为的思考范式所取代。<sup>7</sup>

这种取代实际上是对西方社会学客观性原则的批判。在客观性原则的支配之下，从事调查的田野工作者与他所要调查的本土人之间在劳动的分工上有着明显的区分。孤独的田野工作者是有文化的人，而本土的人则不是。依照客观性的田野工作的规范，本土人是在说话，而田野工作者则是在记录。而照帝国主义的规范来说，本土的人提供了原始的材料或数据，用以在大都市里进行分析和加工，二者之间是极为相似的（Rosaldo 1989: 31）。所以才会有特纳所说的，民族志的“眼睛”便是帝国主义的“我”（Rosaldo 1989: 41）。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自六十年代以来的批判意识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对自己学科以前的客观主义的范式的主动抛弃。在经历了这样的一种范式转换之后，经典的人类学的写作经历了新的批判，像埃文思·普里查德所描述的努尔人社会的一体化的、静态的特征受到了后来学者的质疑。人们开始追问在英国的殖民者的所谓寻求和平的统治之下。难道努尔人不经历什么改变这样的问题。

反观我们学术的发展史，我不得不说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上，曾经有过一种内部殖民的宇宙观念大行其道的时期。这种宇宙观念以知识的有无为依据将中国的社会分化成为有文化的城市和无文化的乡村这样的两个部分。另外城市和知识分子展现的是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心态，而乡村和农民被看作是要被现代知识所征服的殖民地。

另外，这里应该重申的一点是，我们的调查并非充足，而是不够。够的是数量，而不够的是深度。这种深度含有两个层次，一是我们或许需要有更长时间和更持久的耐心来调查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实际；而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主流话语的同时也应该批判自我。在今天或许应该牢记在心的是，我们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他们也有权力来对我们的书写、伦理和政治进行询问。如此一门含义丰富的社会学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扎下根来。

## 人类学的中国与世界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有不少学者论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为了在中国学术领地中恢复人类学的地位，大多数学者把他们的入手之处放在人类学学科如何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以及人类学如何通过应用研究来引起国家的重视这两个问题上。我能理解这两种看法提出的缘由，但不能赞同其入手方法。首先，我认为，人类学学科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于它的田野工作方法和论述风格（包括理论）的独特脉络上。倘若中国人类学者不对自身学科的这两点独特性出发谈问题，而是反复地重复学科之间关系和矛盾的“故事”，那么，学科建设就会成为空谈。其次，

<sup>7</sup> 参阅 Renato Rosaldo (1989) 第 37 页的内容。

